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青年学者论丛

情报·外交·国家战略



贺艳青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青年学者论丛

情报·外交·国家战略

贺艳青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报·外交·国家战略/贺艳青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学者论丛)

ISBN 978-7-5098-1678-3

I. ①情… II. ①贺… III. ①对外政策—研究—中国

IV. ①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8912 号

责任编辑:王世英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 dscbs.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45mm×210mm 1/32

字 数:75 千字

印 张:3. 875

印 数:1—1000 册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1678-3

定 价:11. 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687

序

欧阳淞

值此欢庆五四青年节之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学者论丛》即将问世。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我很乐意为这套丛书作序。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2011年7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我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他满怀深情地指出:“我们党的队伍里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90年风雨而依然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保证。”2012年5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向广大青年提出了坚持远大理想、坚持刻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苦学习、坚持艰苦奋斗、坚持开拓创新、坚持高尚品行的五点希望。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着对广大青年的谆谆嘱托和殷切期望,使我们深受教育、倍受鼓舞。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同样取决于青年。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党史工作,对广大党史工作者给予亲切关怀、寄予殷切期望。尤其是2010年党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召开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以来,党史工作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形势。新形势下,如何不断地以资教育人的新成效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出新的贡献,关键在人才,关键在青年才俊的不断涌现和茁壮成长。

党中央对党史工作的重视和关怀为青年党史工作者成长进步创造了良好条件,党史工作面临的光荣任务为青年党史工作者大展身手提供了广阔舞台。要实现党史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要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创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培养造就一大批青年党史人才摆上更为重要的议事日程,进一步为青年党史工作者成长进步、建功立业提供良好环境和条件。

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30多年来,几代党史工作者中的大多数都是从青年时代就献身党史事业的。他们无私奉献、奋发有为,为党史事业发展贡献了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又一代党史工作者退出工作岗位,进一步加强青年党史人才队伍建设,使他们尽快成长为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的骨干力量,进而成长为党史学界的名家、大家,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组织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学者论丛》,就是在党史系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加强青年工作要求的一次重要举措,也是为青年党史工作者成长进步搭建的一个重要平台。

这套丛书的第一批共有10册。每一册精选一位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研究人员在全国中文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部分党史研究论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主要有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可以促使青年研究人员在收获时间耕耘,通过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总结成功经验,进一步明确学术目标,增强不断奋斗的自觉性;二是可以搭建一个增进了解的平台,将我室的青年研究人员介绍给广大读者,将他们的作品介绍给社会各界,并增进他们与党史学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三是可以使青年研究人员从广大读者的反馈意见中,寻找差距,弥补不足,优化治史方法,进一步提高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

毋庸讳言,这套丛书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对于青年研究人员来说,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一段经历的回

顾,也是一次“经风雨、见世面”的机会。毕竟,他们付出了努力,他们在成长、在进步、在成熟。故以“青年学者论丛”励之。

党史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广大青年党史工作者“坚定理想信念,增长知识本领,锤炼品德意志,矢志奋斗拼搏”,在党史工作宽阔舞台上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不断创造新的业绩、尽情展现人生价值,让青春在为党史事业的繁荣发展而矢志奋斗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012年5月8日

目 录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断的几点思考	1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与第三世界	7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情报界对中苏分歧的评估	25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共产党的 社会治理和政治运动的分析与评估	48
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实现 ——兼论 1955 年前后的中苏关系	73
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端 ——西柏坡时期的中共外交工作	91
后 记	115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断的 几点思考

毫无疑问,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获得了巨大成功,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一度准备积极践行,却又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这一设想。建国3年以后,中国就匆匆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从此中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渐渐发现:许多过去被否认的东西重新显露它们的价值、焕发出新的活力。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许多思想、制度也是如此。于是对新民主主义的研究就有了现实的意义。这种研究不是一种理论的复归,而是一种历史的思索,为的是对照今天,确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政策得以正确地贯彻,确保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稳步前进。在此,笔者不想就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放弃和实践中断的历史价值作出判断,只想就其放弃和中断的原因作一具体分析,而且,在笔者看来,这一放弃和中断还有着某种的历史必然性。

原因之一：对现实物质利益分析的偏差

首先，到1952年下半年为止，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基本完成，土地改革运动行将结束。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为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3年的平均年递增率为21.1%。同时，国民经济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国家支持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国营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主义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4.7%上升到1952年的56%。这种经济生产的成果使得全国人民深受鼓舞，也使得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人产生了过于乐观的情绪，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生产力的状况以及精神动力在劳动生产中的作用。举国上下对社会主义的实现信心大增，热情高涨。

然而，在这种经济快速回升发展的情况下，物质利益的分配也产生了小小的不谐之音：其一是农村在土地改革之后、中农队伍壮大的同时，也出现了少数富农造成的一些新的“剥削现象”，而且这种现象被有意夸大；此外，富农对于初级合作社有抵触心理，他们往往通过屠宰牲畜、破坏工具、消极抵制合作社的“充公”和“平均”。其二，是在“五反”过程中发现一些资本家投机行贿，扰乱市场，妨碍国营经济的“五毒”行为。这使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人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认为新民主主义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条件下，彻底地消灭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就不会产生这种现象。而且，由于长期的土地革命，党的

干部积累了农村工作的经验,可以逐步引导农业的合作化运动;城市里的工商业也有了公私合营、统购包销等经验,党中央认为过渡的时机已经成熟。

其次是实现现代化的迫切愿望。由于西方国家和苏联走上富强的道路都得益于工业的发展,当时的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便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并且,苏联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更看重于重工业的发展。而重工业是投资密集型的产业。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策略下,在原料、燃料、资金、技术等方面,都要其他产业让步。为了不让私人资本争夺原料和市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下,由国家全盘操纵经济的活动。并且,要保证工业生产的正常发展,需要有农业的支援:一方面是生活资料的需求增大,要求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增加以满足重工业人口增加的需求,在当时的条件下,农村合作化道路是增加劳动投入、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要从农村获得部分的资金积累,须在农村合作化的形式下,对粮食进行统购统销。因此,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认为进行社会改造以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农业合作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原因之二:意识形态的僵化与理论的欠缺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题从“社会主义”概念产生开始就争论不休,至今仍在“百家争鸣”。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基于由马克思创立并经过列宁发展而来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

建立在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而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又是结合了俄国的历史和现状,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制度化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中国共产党所认定的社会主义,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苏联模式”的色彩。然而中国有自己的历史与国情,“苏联模式”所展示出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在苏联后来的历史中也证明了它的不适应,更不用说情况殊异的中国了。另外,中国共产党也不可避免地在认识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是重农轻商的,没有从理性、价值、私有制出发的资本主义思想及源头进行深入研究,而小农思想中的“世界大同”与权威主义思想,影响了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于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禁锢了其社会理论的发展,影响了其社会实践。

虽然,当时党内有些人曾坚持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忠诚执行《共同纲领》,但是这种巩固,也是为了发展经济,引导人民,最终实现社会主义。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搞多长时间,在什么条件下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等问题则并没有明确清晰的规定,处于探索过程之中,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并没有解决。

原因之三:国际环境因素的误导

50年代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急于进行过渡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当时冷战的局势已经形成,西方集团与苏联东欧的对抗使得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难以独善其身。受意识

形态的影响,西方将新中国当作新的敌人,对中国施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于是中国人民对西方的旧恨之上又添新仇,仇视西方的心理进一步发展。中国人对西方尤其是对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否认,使得实质上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处境更为尴尬。

而这时的苏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积极鼓励的,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以它自身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向中国人民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1952年10月刘少奇访苏期间,就过渡时期的设想专门征求了斯大林与苏共中央的意见,斯大林对中共的过渡设想表示了赞同与支持。

在西方与苏联的对比中,中国选择了苏联,这是由于当时的形势所迫,也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

领导人个人意志起到的作用在不同的制度下是不同的。党的组织制度是民主集中制,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体也是“民主集中制”,而它“集中”的一面在极有魅力的领导人时代过于充分地发展了。革命战争的实践与新中国建立后的一场场运动,将毛泽东送上了神坛。制度约束的机制对最高领导者难以发挥作用,权力的制衡不被重视,使得领导人的意志有时竟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人治而不是法治的传统在现代的中国仍然根深蒂固。这也是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在此后的新民主主义实践中难以发挥它理应是最高约束作用的原因。

总而言之,新民主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策略,是中国人民通向现代化的一种途径,就注定了它的可变性与短暂性。因为在历史的形式变迁和突发事件情

况下,手段的改变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在我们比较沉重地思索新民主主义夭折的历史时,也要对今后类似的可能进行防范。要确保一项政策、理论得以完全贯彻,首先它要是正确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它要有准确的界定、清晰的内容;其次,它要有实现的精神动力,也就是要有社会舆论的支持与大众心理的向往。

(载《理论导刊》2001年第12期)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与第三世界

对毛泽东国际战略的研究,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和新中国外交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目前研究者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构成因素的分析,多集中于大国关系、意识形态、国内政治等方面,以第三世界为研究重点的文章并不多。本文旨在对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中期,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第三世界因素作一初步考查。

一、影响毛泽东对第三世界认识的几个因素

国际战略,包括对国际社会所处时代和基本发展规律的认识,包括对国际格局的判断以及在此判断下所制订的对外关系原则和方针政策。

毛泽东对国际格局的判断和所采取的相应对外政策,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的。然而,毛泽东对于国际社会所处时代背景的认识,却根源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之一——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和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对毛泽东的时代观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将他所处的时代概括为“战争和革命”为主题的时代。早在 1926 年,毛

泽东就指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①。1940年,他又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②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观和国际战略思维始终建立在这一判断基础上,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部崩溃的时代”^③。因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所以“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④。虽然在不同时期,这一判断有所差别,对战争估计的严重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对革命的向往和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始终占上风。邓小平后来回顾道:“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⑤在“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时代观和战争观的背景下,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充满着革命激情。无论是“中间地带”理论中对两大阵营对峙的分析,还是“三个世界”划分中对于霸权主义的批判,都或多或少地建立在支持“世界革命”和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这一前提下。

另外,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思想在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中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模式。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是善于灵活应用统一战线策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6页。

④ 《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7页。

略的大师,表现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统一战线思想在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应用也是由来已久,无论是“中间地带”理论还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是一种对国际力量进行敌我划分的方法。

“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是中国国内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 10 年,也是国际战略调整与转变的 10 年。在这个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都出现了分化;民族民主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形成高潮;中、美、苏 3 国关系有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当时西方流行的“三个世界”理论已将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称为“第三世界”,这和毛泽东 70 年代初形成的“第三世界”的概念基本吻合,因此本文就将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简称为“第三世界”。经过这 10 年,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不再把中国列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将中国明确划归为第三世界,并对于第三世界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赋予了殷切的期望。

可以说,毛泽东一生的国际战略,都没有摆脱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维方式,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是在毛泽东这一思维模式下形成的,有相似的时代判断和斗争策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比较这两大理论,无论是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划分还是“世界革命”的目标和方式二者都有了巨大变化。相应的,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盟友和对手也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从建国初的“中间地带”理论发展到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形成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经历了一次成功的